

浅谈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文化治理的实践路径

——基于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视角

何琳嫻

(星海音乐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510500)

摘要: 乡村基层公共文化机构在乡村文化振兴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尤以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代表。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是文化治理的主导者, 需要培育文化空间, 为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 实现有效供给; 要整合文化资源, 传承、弘扬传统文化; 要规范、引导基层精神文化建设, 缓解城乡二元化冲击、应对乡村文化失调、提升文化认同; 为乡村文化振兴夯实发展根基。

关键词: 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治理; 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

自 2012 年文化部发布《十七大以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体系成就》以来, 基层文化服务机构的建设开始迎来发展白热化阶段。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不断实践、探索, 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在我国村(社区)的文化治理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已经超越了原先其物理距离上的建设意义。在乡村文化建设转型期, 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更为凸显的功能在于唤醒公民主体意识、完善我国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我国供给侧改革上。简而言之, 其当前的主要功能在于文化治理。本文就当下的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文化治理现存的问题展开讨论, 并提出相关的实践策略。

一、研究现状

当前, 在我国乡村振兴的战略方针指导下, 众多学者针对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展开了不同层次的探讨、研究。在建设上, 卢希林梳理了当前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功能定位以及当前的发展问题, 提出应当从基础文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及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四个方面作为中心提高建设质量的途径¹²。在服务效能方面, 李国新提倡整合资源、强化末端、突出综合以此来提升效能¹³。在提升服务效能上, 唐宣构建了一套效能测评指标体系, 测评得出长沙县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服务效能的症结, 并提出相关的提升策略¹⁴。在功能定位上, 由于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与我国推行“农家书屋”的服务定位上有着异曲同工的特点, 徐同亮从公共阅读服务功能作为研究切入点, 探究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在发挥的功用以及发展策略¹⁵。此外, 陈信¹⁶、李文钰¹⁷等学者分别以全国各地成功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案例为研究对象展开探讨。

综上, 目前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几个方面: 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设施的使用率、配置率、设施服务的覆盖面、服务半径的可达面等; 公共文化服务, 包括供给效能、服务效能、服务体系、服务机制等; 人才队伍建设。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制度仍未完善, 其发展的过程仍遵循着我国行政体系的规章制度开展、落实工作。然而随着乡村现代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发展变化, 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逐渐与本土文化相适应, 其功能不再仅是简单的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他成为群众文化交流、沟通反馈的核心渠道, 成为乡风文明、村规民约建设的重要阵地, 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主要抓手。他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群众的文化需求变化, 做到适时调整文化供给, 其灵活、高效的服务特性与上层按部就班的行政体制之间的矛盾是其建设问题产生的根源。

二、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文化治理现存问题

1. 资源整合意识淡薄

由于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功能定位是服务, 并由于其“公共性”“非营利性”使得各领导者的惯性思维难以与“资源”相挂钩, 更是归咎于“资源过度扎堆中心城区”。然而, 公共文化服务的实现在于文化产品有效供给, 文化产品的形成是脱胎于当地各类文化资源的有机组合。在当下运作过程中, 许多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保留着“等、靠、要”的陋习, 或者把中心的建设当作是政绩的“垫脚石”。没有实地考察, 深入挖掘、开发当地的文化资源, 对传统文化实施保护并转化利用, 甚至出现“重建、轻管、轻用”的形式化工程。当今时代不同与往日, “开放化”必将取代“封闭化”, “大同”必将替代“单一”。

2. 服务供给方式僵化

供给与需求总是相伴而生, 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供给效率是以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是否契合群众文化需求作为评判标准。笔者在调研中, 以公益课堂为调查内容发放一份满意度调查, 调查群体限定在经常参与大步文化活动的群众, 约 800 人, 回收问卷 209 份。结果显示(见图 1、图 2), 群众对公益课堂评价“满意”达到 91.8%, 但是对公益课堂的规模评价却只有 78.57%达到“较为合适”以上。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受到地方限制, 额定人数的公益课堂已经无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此同时也反映了在开展公益课堂之外, 应当因地制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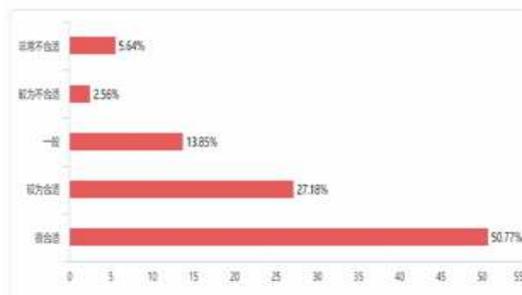


图 1 公益课堂规模(人数)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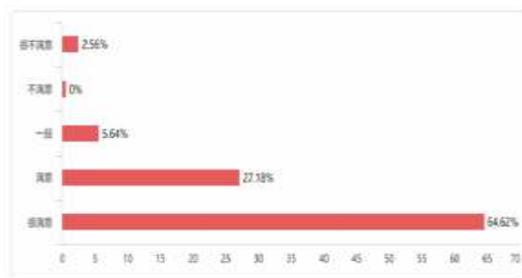


图 2 公益课堂满意度调查

3.文化服务体制错位

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隶属村(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乡村中一直是附属在村委(社区居委)或其个别部门下,直接导致居委与中心的职责不明确、行政观念与服务观念相互冲突。在这样的体制下,首先出现的问题便是众多学者一直以来提出的人才匮乏。据笔者调研了解,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管理者一般由居委村支书或宣传部领导担任,中心的员工多是采用政府投标委派社工就职。社工大多缺乏专业的文化知识和能力,缺乏专业的文化艺术教育,对于文化建设规划的知识涉猎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对于中心上层领导所委派的工作就是完成即可、见步走步,工作内容碎片化、零散化,这也是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一直以来难以实现优化提升的症结所在。受到体制的约束,中心对社工没有直接的聘任任免权限,大多社工在中心任职会有时间期限,限期一到便进行人员更替。人员的流动性成为系统化工作流程、专业化人才培养的“拦路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心的长期发展规划。

由于部门叠置,某些地区的居委“官本位”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对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服务性质缺乏认知。体制错位亦导致财政使用的份额在一定程度上受限。

三、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文化治理实践路径

1.构建文化空间

公共文化空间是政府与社会群众之间的枢纽,是群众有意识进行公共活动的平台。他是一个将文化具象化、实现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场所,注重民众的“话语表达”,能够吸引、聚集不同文化资源。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是由政府主导,作为当地主要文化资源供给主体,是满足群众文娱需求、指导乡村文化工作和协助管理乡村文化形态的公共文化空间。

一般而言,他有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在精神层面上,他是不但指涉社会精神文明、道德规范建设,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是“美丽乡村”的前沿阵地,是乡村思想道德的主战场,是乡村群众精神文化培育的核心课堂,也是发展先进文化和弘扬时代精神的重要舞台^[8];而且承担着重构群众文化自信的重任,自信的乡村文化必然是独具地方特色、拥有鲜明的地方个性。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在物理距离或其功能定位上,无疑是构建文化自信的最佳场所。在物质层面上,通过中心的场所设施,如图书馆、讲习空间为民众提供各种公共文化活动和文化便利服务,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心应当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推进戏剧、音乐、舞蹈等高雅艺术向下传输,开展普适的读书分享会,弘扬传统文化。在当下大数据时代,最不可忽视的便是数字化资源,因此,基层亦应当引进数字文化资源,推进优秀网络精品文化传播。

2.整合文化资源、实现共建共享

由于受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上层体系的规制,传统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基本处于单向封闭状态,缺乏必要的社会连接。在乡村文化投入较为受限的前提下,文化资源形成合力,形成共建共享的局势才能形成聚合力推动发展。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根据该方案,统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整合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的职责,组建文化和旅游部,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在发展理念、工作方式、产业引导、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按照“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原则探索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之路,推进文化和旅游体制机制改革^[9]。文旅融合印证了文化治理过程中与多

方资源相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公共文化资源整合必须纵观社会上的多方力量,以政府、社会和市场三巨头作为主线。一要整合政府多部门的职能,建立联合机制和共享机制,打通相关部门的连接线和资源共享平台。二要整合社会多方文化资源,尤其是社会新乡贤,通过各项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各类专业人才在基层开展工作或项目。此外,与当地的各类文化艺术设施,如美术馆、博物馆和图书馆建立联动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三要与文化市场相协调,形成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的均衡态势。例如借助现有的品牌文化力量,打造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提升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文化形象。

3.唤醒村民主体意识、提升文化认同感

通过文化治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可窥视,如今文化治理开始向治理主体“自由治理”转变,被治理对象“内化”管理,并涉及“无止境的自我审视与自我变革”的过程。村民作为乡村生活的主体,他们应当也是文化治理的主体。首先,以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有序开展为前提,要转变为“喂养式”的服务模式,提供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渠道。中心可以探索一个“谏言立功”的鼓励机制,个人的立德、谏言虽然是个人行为,可是在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却能够反过来号召村民养成文化表达的习惯。其次,在畅通的反馈机制下,维护好现有群众的文化权益,不断向外拓展参与群体,借鉴国外的文化理事会制度,中心可成立“村民文化治理理事会”,开放中心的资金投资渠道,从机制上保障公民参与文化治理,真正实现村民“当家作主”。最后,形成乡村文化场域,重构礼法守序树立乡村共同体价值认同,形成凝聚力,例如培养公共文化品牌、利用非遗进行精神塑造等。

四、结语

随着我国文化治理体制的推进,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承担的乡村文化治理的责任将越来越大,以点成面,他也将成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要素。提高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文化治理能力,要坚持因地制宜、发挥各地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打造文化自信的大同意识。

参考文献:

- [1] 卢希林,李文钰.关于乡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思考[J].现代农村科技,2019(08):103-105.
- [2] 李国新.整合资源 强化末端 突出综合 提升效能——《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解读[N].中国文化报,2015-10-22(002).
- [3] 唐宣.乡镇综合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策略研究[D].湘潭大学,2019.
- [4] 徐同亮.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公共阅读服务功能[J].图书馆论坛,2016(7):49-53.
- [5] 陈信,柯平,邵博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以浙江文化礼堂为例[J].山东图书馆学刊,2021(01):12-16.
- [6] 李文钰,周小花.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践探索[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9(03):82-86.
- [7] 卢希林,李文钰.关于乡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思考[J].现代农村科技,2019(08):103-105.
- [8] 吴理财,郭璐.文旅融合三重藕合性:价值、效能和路径[J].山东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8):62-71.